



火把下的宛轉流年

□秋凡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家的老屋是用山上石块砌成的楼房，背倚山坡，前接竹林，左右都是坟地。那些坟地的草丛里，萤火虫与蛇鼠共存，夏夜里，它们在月光下演绎着生命的交响乐。虽然对于这杂草丛生的坟地有些畏惧，但萤火虫的迷人光芒总能吸引我忘却恐惧，只想沉醉于这自然的美景中。

夏夜的风，徐徐吹来，将灼热的楼板一点点地降下温度。我和弟弟从屋里搬出三条长凳，放在下面支着，上面放上一张小竹床，躺在上面纳凉。远远地，我看见萤火虫背着小小的荧光灯，在坟地里的草丛中巡游，一如天上的繁星，在我眼里忽明忽暗地闪烁跳动，不由得心生欢喜。我看着星星点点的萤火之光，听着屋内因疲劳而早早入睡的母亲的呢喃声，枕着此起彼伏、抑扬顿挫的知了声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睡梦中，我被一个螺旋状的光团追逐，不断奔跑着。我从梦的世界，跑到了梦之外的世界。直到被母亲一巴掌拍醒，我才蜷缩着从墙角里站起来。母亲啐了一口唾沫，在我的额前轻抹了几下，用坚定的怀抱抱着我说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。”为了驱散我的余悸，母亲点燃了一根竹火把。那些竹竿，是某个闲暇日，母亲特意从竹林里砍回来的。接着，她用锄头敲裂小竹子，放在堰塘里浸泡了一段时间后，捞出来洗净、晒干，以备夜里走家串户时使用。这样处理后的竹竿，非常容易点燃，烟雾很小，燃烧时间又长，且不怕风。风越大，竹火把烧得越旺。即便是在雨天，竹火把也不易被浇灭。

弟弟睁开惺忪的睡眼，迷惑地看着母亲，问：“姐姐怎么了？”

母亲说：“姐姐白天受吓了，做噩梦了。”

那天白天，我和弟弟在楼顶上玩耍，见同村长长得五大三粗的蔡叔拿着两个拳头大小的石头，怒气冲冲地朝我家跑来。“嘭”的一声，一个石头砸向了大门，接着又听见厨房里传来咣当的声响，煮猪食的大铁锅被砸开了巨大一个口子。我从楼上空心砖堆砌的烟囱里，注视着蔡叔的一举一动，吓得大气不敢出，好害怕他捡起石头，砸向我和弟弟。他走出地坝时，猛地回头，眼睛像激光一样，恶狠狠地扫了我一眼，把我吓得直哆嗦。原来蔡叔和母亲因田地边界问题起了争执，母亲无奈之下请来村长出面调解，最终蔡叔被迫退还巴掌大的一块田地后，心有不甘，遂产生报复心理，砸坏了我家大门和铁锅。他暴力的举动，吓坏了我幼小的心灵。

母亲看了看坟地，又看了看正燃烧着的火把，挥手让我和弟弟回屋里睡，她随后就来。

蔡婶家在竹林边上，距离我家很近，拐两个弯就到，走起路来也就两分钟脚程。那是一条羊肠小路，小路两边是浅绿深翠的庄稼地。黑夜里，如果没有灯火照探路况，说不定就踩到了躺在路上乘凉的蛇。

我隐约听见蔡家院子里传来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忙心急如焚地催促起母亲来：“你赶快点，电视已经开演了。”母亲劳累了一天，有时吃完晚饭洗刷结束，很想倒头就睡，但见我兴致盎然的样子，不忍拒绝，只好打起火把，领着我和弟弟去蔡婶家追剧。母亲举着火把走在我们中间，一路上一再叮嘱我们：“今天哪个再打瞌睡，明天就别去看了。”

因为头一天，我们追完剧，已是夜里九点，弟弟瞌睡来了，把蔡婶家的凉椅当成了自家的床，倒头呼呼大睡，任凭我们怎样叫唤，他就是不醒。被母亲拍醒后，弟弟一边哇哇地哭，一边恍恍惚惚地往蔡婶里屋的床上走去。在一众人的哄笑声中，母亲一把拽住弟弟，哭笑不得地说：“明天不能让你们来看电视了。”所以，去之前弟弟一再保证，绝不打瞌睡，要睡也回家睡。母亲见他信誓旦旦地下了保证，便允了我追剧的请求。

到了蔡婶家，我和弟弟慌忙寻了小凳子坐下，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。母亲熄了火把，也坐在了人群中看起电视来。蔡叔打趣母亲说：“你还真有闲心，打起火把陪娃儿看电视。”

母亲笑着回应他：“孩子们爱看，我就陪着，光他俩来，我又不放心。”

这期间，母亲多次转头看我和弟弟，见我们兴致大好，便没有催促我们回家。等一众人姗姗离去，母亲揉了揉揉蒙眬的睡眼，发现弟弟又睡着了。这次，她没有叫醒他，而是将他背了回去。

母亲的影子与黑夜一同沉寂，燃烧的火把摇曳着脉脉温情。她驮着弟弟，似自言自语地轻声说：“等我老了，你们会背我吗？”

我爽快地回答：“背，肯定背。”

母亲故意逗我说：“不得往堰塘里背吗？”

我咧嘴笑道：“绝对不会。”

两年后，母亲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地买了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我们终于结束了打着火把去别人家“蹭看”电视的日子。再后来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，大家进入了电器照明的时代，火把彻底退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

许多年后，我组建了家庭，也成了两个小孩的母亲。在一次车祸中，先生的左大腿骨折了，经过一年时间的医治及调理，他的身体渐渐康复，心理却“残疾”了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变得乖戾暴虐、敏感多疑，在我工作的地方无端闹事，逼迫我辞职在家带孩子。当我做起了全职宝妈时，他又满口都是责怪我的言语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受够了这样的生活，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，我提出了离婚。不等“离婚”二字说完，先生便一巴掌挥了过来。争执过后，我拿起手机夺门而逃。

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天空下着淅沥沥的小雨。我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衣，在人影稀疏的马路上狼狈不堪地奔跑着。这时，母亲打来电话，关切地问我：“最近你和他还好吧？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你像小时候一样，被‘鬼火’追着撵，嘴里不停地喊救命，于是给你打个电话问候一声。”我哽咽着说我们很好，然后匆匆挂掉电话，默默地擦拭着脸上的泪水。看着雨中忽明忽暗的手机亮光，我突然又想起了童年的噩梦，想起了那个站在火把前叹息的孤立无援的留守妇女。她在一根火把燃烧的时间里，在四下皆是坟地的黑夜里，又在沉思什么。那一夜，我举着一支无形的火把，奔跑在风里雨里，陷入了良久的沉思。想起自己的任性，想起先生的不易，想起了孩子惊恐的眼神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内心有好几道坎，它们像墙一样把我堵在中间，我出不去，外面的人进不来，而我只有自责与愧疚。此时此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母亲为我照亮黑夜的那支火把，已由实物，变化成了某种精神力量和生活智慧。

当我全身湿淋淋地回到家时，先生已经入睡了。我没听见鼾声，只看见床头柜上有张纸，上面写着：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不让你上班，会让你失去安全感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翌日，先生叫来所有亲友，当着众人的面，给我赔礼道歉后，他又把家中所有的财产全权托付给了我。

听了先生的话，母亲脸上的表情几度变化，最后复归平静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两个人过日子，用暴力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。凡事有商有量，才能家和万事兴。”

我听着母亲平和的声音，心中悠悠淌过一条岁月的河。谁在黑夜里为我点亮了火把？火把的光影随风摇曳，宛转流年，流年宛转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开州作家协会会员）

多收了1000元

□周成芳

我一直在寻找一位叫阿平的客户。前些日子，他受单位委派去北京出差，在我所在的旅游公司订了一张机票，金额为1280元。他通过银行转账付款，但我的收款短信提示却是2280元，足足多了1000元。

如今，代理一张机票的利润不足20元，这里白白多了1000元，简直是飞来横财。可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，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，就是尽快联系本人退回多给的钱。

可要找到他本人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为机票是他们单位办公室订的，只留了个座机号。我赶紧回拨过去，接电话的女士说阿平是他们下属单位的职工，不知道他的手机号，只给了我一个他科室的座机。我随后拨打了她提供的号码，而工作人员不是说阿平在开会就是在下乡，反正联系不上本人。

连续两天，我都打了电话，但总也找不到阿平。我恳请他单位的同事提供一下阿平的手机号，对方似乎很警惕，反复追问我有什么事。我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，说我必须联系上他本人，把他多给的钱退还给他。但对方很不配合，反复跟我说阿平在开会，接电话不方便，然后说他大概什么时候会在，让我在特定的时间段再打来，随后，“啪”地就将电话挂断了。挂电话前，我分明听见那人正小声地和身边的同事说：“现在网络上有一种新型骗局，先是让对方提供账号……”

我有些无语，本想做善事，却被当成了坏人。也难怪，这年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商家多是唯利是图的，谁能相信有人会把含在嘴里的金子再吐出来呢？

怎么办？这笔钱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据为己有，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阿平本人。我想起阿平单位的一位中层领导，刚好跟我是朋友，只得采取“曲线救国”的方式向他求助。我打电话向这位朋友详细说明了情况，这个领导开玩笑地说我觉悟高，当即为我提供了阿平的手机号。

我拨通了阿平的电话，为避免他产生同样的误会，我先大致跟他说明了情况，绝口不提让他提供账号的事，而是让他先去银行查证一下交易记录。

没多久，阿平回了电话，查明的确是他自己粗心，多打了一千元过来，他说这段时间一直在下乡，整天忙得晕头转向，转账的时候不小心整错了，他说要不是我主动联系他，他可能一直都不会察觉这事。

随后，按照阿平提供的账号，我很快就将他多给的1000元转了过去，感觉心里也踏实了许多。阿平收到转账后发来短信连连道谢，我回复了一句：这是我应该做的，生意人，当以诚信为本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把自己的绰号喊得茂盛粗壮

□徐作仁

从一杆叶子烟中，父亲回到地里
把每种植物的名字、眼神和习性
再谙习一遍，把农历某月某日
再狠狠地掐疼一回

泥味粪味和作物拔节分蘖之味
像朋友把父亲包围
用竹棍、鸟语和夕晖支起窝棚
父亲安坐整整一个甲子

把鼎锅里面的黄昏煮得滚沸
把柴火下头的红苕煨得溜熨
再点两捆艾蒿将窝棚熏一遍
父亲不担心夏夜会遭蚊虫叮咬

枕着山蛙草虫，枕着好心情
枕着苞谷起了劲的长势
父亲用梦话，用土里土气的腔调
把自己的绰号喊得茂盛、粗壮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